

陽春文史資料

第十七輯



阳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阳春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

政协广东省阳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四年八月

目 录

蟠龙游击区的统战工作和两面政权的情况	陈 枫 (1)
辛亥革命后我县粮政及其改革情况	刘传琪 (6)
五十年代初春城镇除“三害”情况	根据刘传发、陈学枢同志口述整理 (9)
阳春邮政、电话发展情况概述	吴桂芬 (16)
建国初期阳春电报通信概况	李乾中 (20)
西山陂后记	肖国光 (22)
从解放到“文革”前的阳春音乐活动	曾宪梯 (27)
阳春舞蹈艺术发展史略	欧祝贤 (33)
舞扁狮	欧祝贤 (40)
舞金龙	欧祝贤 (48)
合水圩史话	许洪方 蔡里荣 (61)
建国前合水当地人经营的大商店简况	李宜瑞 (68)
育英才 千秋功 ——合水地区教育今昔.....	许洪方 黎宗骥 (70)
春湾圩镇文化教育	谢 麟 (77)

蟠龙游击区的统战工作 和两面政权的情况

陈 枫

解放前蟠龙是个贫穷落后的山区乡，在全县国民党政权中，地位并不重要。但这个乡的统战工作和两面政权，对我党我军进行革命工作很重要。是因为蟠龙这个游击区，对我军在阳春军事斗争，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虽然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经济不发达，但对国民党的统治威胁很大。我党我军的活动，使敌人经常处于捉摸不定坐立不安的紧张状态。

搞两面政权，是我党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采取的一项政策策略。在游击区，正确地运用这种政策策略，开展统战工作，建立两面政权，可以掩护我军的行动，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帮助我党我军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工作。它对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应付，实际上帮助我军工作。解放前蟠龙属比较巩固的游击区，都是因为搞了两面政权，排除了国民党政权的阻力和干扰，使我军和地方工作同志的活动能够畅通无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定条件下两面政权也可以起积极作用。

蟠龙没有什么影响较大的统战对象。沉冲村有个国民党县参议员薛自谋，这个人在县、乡里也没有什么影响，政治上没有什么地位，经济上也没有实力，在上层统战对象中他排不上名次。我们的统战对象主要是国民党乡保政权人员和群众中有一定威望的群众领袖。但重点还是做国民党政权中的“当权派”的工作。

蟠龙乡（包括今蟠龙、扶民、林田等管区）共有九个保，其中蟠龙五个保，扶民三个保，林田一个保。我到达蟠龙工作时，国民党乡长是陈国福。他是扶民陈屋寨人，一九四二年上台，一九四六年下台。在任期间做过一点好事，支持过当地农民开展大斗改市斗的合法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农民对这件事是满意的。他兼任蟠龙小学校长时，中共党员黄云、严仕铭、陈明等同志都在学校任过教，知道他是个贫穷的小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策法规积极执行，李宗望同志被捕，是他打电话给国民党龙湖乡长严文郁派人捉的，所以黄云同志曾通过欧阳念昭口头警告过他。黄云走后，地方党的同志以黄云的名义，写了一封警告信给他。他害怕了，自动辞了职。这个人可以说是被我们赶下台的。

陈走后，接任蟠龙乡长的是吴英仁。吴是扶民旧寨村人。他是一九四六年底上台的。当时的副乡长是黄孔标，是蟠龙孔塘村人。

吴上台后，任用了严仕郁同志当乡干事，并会见过陈庚同志，请陈庚同志吃过饭，也同我见过面，交谈中表示：不能和我军太公开的接近，会引起国民党顾忌，希望我军谅解。他对乡公所人员交代过：乡丁下村，不准带枪，遇见我军人员，要主动回避。这些行动表明，吴对我党我军是采取合作的态度。我们通过严仕郁同志，完全了解敌人的动向。

吴英仁是一九四八年下台的，主要是因副乡长黄孔标和乡丁都参加了我军部队，他的乡长也当不下去了。

吴走后，接任乡长是何大芬。何是林田秋风堀人。副乡长是欧阳念昭同志，他经六团同意去当这个副乡长的。何上任前到刘屋咀村找过我。他同念昭两人分别担任正副乡长，都是征求过我意见的。何比吴英仁更靠近我军，顾虑也少一些。

蟠龙乡的保长除扶民三个保的保长我不熟悉外，其余六个保的保长，我都十分熟悉。同他们见面的机会也较多，对他们进行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是方便的，他们一般都拥护我党我军，对我更靠拢，接触也十分公开，毫无顾忌。

我军同国民党乡保人员建立的合作关系，是经过多次战争扫荡考验的。敌人每次入蟠龙扫荡，乡保人员都提前转告我们。一九四九年，敌人派了一个政警

中队进驻蟠龙国民党乡公所后，曾配合阳江驻珠环的国民党政警中队对我形成两面夹击。但蟠龙驻敌，由于群众封锁消息，情况不明，很少出动。珠环之敌经常对我大八区队和我武工队半夜袭击，有时还越境对蟠龙地区搜索。我和吴子仁政委住观音山时，曾遭遇过一次敌人搜索，但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在大扫荡中，就大八与蟠龙两乡比较，我军和武工队在蟠龙的活动安全得多。我们的医疗站距蟠龙敌驻地只有几里路，一直没有被敌人发现。欧阳念昭同志儿子结婚还请我们到家里吃饭，敌人也没有发现我们。

大扫荡中，我们和群众都有些损失，大寨村的一位地下党员被捕后牺牲了。还有少数本地战士和武工队员被迫自首，或偷偷的离队回了家，大寨村有一批群众无辜被捕。但国民党乡保人员对我们的态度没有变，群众的心也没有变，我们仍然可以在敌人眼皮下活动。

我们对国民党乡政权人员采取争取团结的政策。对他们多做宣传工作，让他们了解国内形势和我党我军的政策，使他们乐于接近我们，同我军合作。

蟠龙游击区统战工作和搞两面政权能够取得较好的成绩，除了黄云、严仕铭等老同志为我们以后的活动打下一些良好基础和六团的领导经常亲自出面做工作之外，我认为还有以下几个原因：（1）我军可以完全实行武装控制，对国民党政权起威胁作用。（2）群

众基础好，我党我军同群众建立了较亲密的关系。(3)我党我军执行了正确的政策，没有伤害过什么人，没有侵犯中农的利益。对敌斗争中，我们没有扩大打击面。减租减息时，我们执行减租政策，允许地主减租后把稻谷运回春城。(4)对国民党政权人员做好统战工作，凡同我军积极合作的，以朋友相待，体谅他们的困难。对他们执行国民党的反动政令、法令，如无法抗拒的，我们采取容忍的态度，不让他们为难，只要是真心实意地与我党我军合作，都信任他们。

我在蟠龙工作多年，还没有发生过国民党乡、保长有公开或暗中同我军对抗的事件。

蟠龙游击区能够建立和巩固，主要是我们在蟠龙乡做了统战工作和搞了两面政权。

辛亥革命后我县粮政及其改革情况

刘传琪

辛亥革命后，我县粮政仍沿用清朝制度。土地私有，可以自由买卖。在县民国政府机构设粮房，有粮差。粮差是专职世袭的。他们专职管理全县粮户和每户该纳多少粮的户口册。征粮则按色米以石为单位，折合现金征收。如有买卖田地者，双方就要拿契约和卖主原契到粮房登记注册。卖主卖去多少田地该多少米，割出过入买主户口册。这叫做割户或过户。否则，应纳的粮仍归卖主负责完纳。每年在早、晚两造收割完毕后开始征粮。征粮时，县民国政府临时派出一个人为征粮委员（不是固定实职，征粮完后撤销）领拿收据（俗称粮串），带着两名县兵、若干名粮差到区乡。粮差带备粮户名册和欠粮清单。他们首先通知各粮户依期完纳。然后，粮差到各村按户催征。那些无能力完纳的贫穷户事先托人送一些钱物给粮差，打通关系，才能拖过这次纳粮。若不送礼打通关系，亲属要被拉去坐牢抵押。

为适应社会发展，我县在1934年改革粮政，实行田亩制。县民国政府成立清丈田亩委员会，全县六个区每两个区联立一个清丈田亩办事处。第一区附城与

第六区岗美联立一个办事处，第二区合水与第三区春湾联立一个办事处。办事处有主任一人，丈田员若干人，绘图员若干人，杂工二、三人。在开始办公时，张贴布告通知，各业主各佃户须按绘图员绘好的、已经编排了段号和丘块号数的田地，将自己所属的田地到办事处自报或由佃户代报填表登记。可是这项工作只有几个月就停了。1936年县民国政府举办丈田绘图员训练班，每个乡公所选送一人参加训练。一个月学习期满后回乡开展丈田工作。绘图员则按田地坐落的土名，分列段号和丘块号数绘制田地图表。在每丘田地插上竹签，写明土名、段号、丘块号数、面积和四边界址以及谁耕属。佃户要把竹签拿到乡公所登记注册，填明业主姓名、籍贯和住址。其中有少数无人拿报的竹签，当地里长把它收拾起来拿到乡公所只登记段号、丘块号数，作为空白田地。绘图丈田工作结束，要限期送交田亩表册。表册有两种：一种是田亩总表，一种是田亩统计一览表。每表填三份，乡公所自存一份，送区、县各一份。县民国政府抄写田亩通知书分发各业主。1937年县民国政府成立地税征收处，撤销粮房，派一名地税征收员驻区公所，负责征收工作。当时规定每亩田地折合金额征收现金。1939年受战争影响，金融波动，就改征实物（稻谷）。县地税征收处改为县田赋征收处。各区成立田赋征收办事处，设

主任一人，股长一人，稽征员若干人，管仓员若干人，仓丁若干人。在每个市场建立仓库，派一名稽征员，一名管仓员、一名仓丁驻仓。1946年县田赋征收处改为田粮科。各区田赋征收办事处改为田粮办事处，原来设置人员不更动。这种粮政制度直至1949年底。

五十年代初春城镇除“三害”情况

根据刘传发、陈学枢同志口述整理

吹鸦片烟、卖淫嫖娼、赌博是旧社会三大丑恶现象。建国前夕，这种丑恶现象在春城镇仍然存在，并且相当严重。因此，在五十年代初，人民政府就着手开展扫除“三害”。

建国前，春城镇的吹、赌、嫖现象比阳春县其他区镇较严重，有四间大烟馆，它们分布在西门街、县前街、~~菴~~埠街和大新街。烟馆内设有烟床和烟具，并出售烟膏。卖淫嫖娼主要集中在西门河堤一带。其中官亭口这一处称为一级的。这里有三条设计精美、雕花画屏的大花艇。艇上设有一个餐厅和几间小房。每条艇有三、四名妓女。这些妓女姿色好，要价高。河亭、竹仔步这处称为二级的。这里都是一般小艇，妓女年纪较大，姿色也一般。另外，在城北河段的一些捕鱼小船也做卖淫之事。赌博在抗日战争前是公开的。赌场、白鸽标厂得经政府允许，定期上交利税。那时春城公开的赌场有四档，它们分布在县前街、洗马横街、~~菴~~埠街和官亭口（河堤码头2桥）。从民国十几年来到抗战初期，春城赌场以官亭口这档为最大，有两

层楼房。赌客也最多。官亭口是阳春县城水陆交通要道，四面八方客商云集。这里既有赌馆，又有一级的妓馆花艇。那些有钱的客商，官场要员和当地豪绅，都喜欢到此寻欢作乐。

当时在春城各鸦片烟馆吹烟的约有40人，这些人年纪大多数在40岁以上。20来岁的地主仔也有三两个。地主、官僚、豪绅在家里置有整套吹烟具，在家吹烟。

“瘾君子”每天至少要吹鸦片烟两次。每次要一小包烟膏，价钱白银二毫。解放前夕，春城吹烟的少了，只剩下20至30个老烟鬼。在春城公开身份的妓女约有30人。这些妓女来源，一是抗战期间，日军入侵四邑等地无家可归的逃难来的女子；二是鸨婆、鸨公收养或者花钱买贫穷人家的小女孩，养到13至14岁，就叫其接客；三是丧夫的年轻妇女，以此为活；四是纯粹以赚钱和丈夫让老婆卖淫。概括起来，卖淫有三种情况：被迫、被骗和自愿。被迫、被骗者是绝大多数。嫖娼者大多数是有钱人家。到官亭口一级妓船的，一般都是达官贵人，地方豪绅和商贾。入赌场赌博的，多数是40岁以上的人。这些人中，有些是大富翁，如游君寿，他每次下注总有十几担谷。有的是中产人家、商户。个别是穷人家，还有一些是身无分文的“捞家”、“靠鬼”。当时有名气的赌馆老板有陈北桓、吴玉瑜、蒋操生。其中，陈北桓开有赌馆、标厂和番摊，发了大财。

吹、赌、嫖危害自己、危害家庭、危害社会。凡是久吸鸦片烟的人都瘦骨如柴，弯腰驼背，行路不稳，丧失劳动能力，而且多数失去生育能力。春城陈杏水原来家产较好，由于吹烟赌博嫖娼，结果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赌博败家，欠债，走上偷抢杀人之路。灯笼街的“打靶路”（人的绰号）吹烟赌博花光了钱，就勾结县前街的谭爱堂去勒索灯笼街一个老地主婆的钱，未遂，就连人也杀了。谭爱堂被判死刑，枪决了。而“打靶路”（人的绰号）与当时阳春县长董载泰有裙带亲戚关系，没有枪决。当时得性病的妓女占60%—70%，这些妓女继续接客，结果性病不断蔓延。那些性病晚期患者全身象蛇咬虫钻，又痒又烂，流脓出水，生殖器腐烂发臭，直到痛苦万端才死去。那些男性患者，病毒传给老婆，危及胎儿。凡因嫖娼得性病的，家人憎恶，族人鄙视。

民国政府对吹、赌、嫖也曾禁过，但禁而不止。抗日战争后期，阳春县民国政府成立禁烟局，不准公开上市烟土烟膏。但权势者凭恃权力把贩来的烟土，制成烟膏售给熟客。当时警察也到处查缉吹烟者。抓到后人后，罚款就了事。而所罚的钱财全部中饱私囊。禁烟局里也出售烟膏。内室设有烟床、烟具。因此，禁烟徒有虚名。民国政府曾经允许妓女注册卖淫，规定妓女每年上缴若干“花捐”。入册的妓女上街要戴

白花，以示合法。后来政府取缔卖淫，结果明娼变成暗娼，继续营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规定禁止赌博，不准摆番摊、开赌馆、开白鸽标厂。但是，春城镇私下开赌的有增无减。特别是那些在阳春有势力的，或者那些烂仔地痞，他们在屋里设赌，屋外放风，一遇查缉，及时发出讯号，撒散。政府也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轻易惹他们。有时他们到城外的卧鬼岭、大王宫、烟灯坡等地设赌，派人望风。查赌警察抓到赌徒，罚款后就放人，而所罚之款入了私人腰包。这样，赌博屡禁不止。

1949年10月22日，阳春解放了。阳春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指示阳春县公安局迅速铲除春城镇的吹、嫖、赌三害。县公安局则把此任务交给刘传发、陈学枢等同志负责。刘传发家居春城，是地下党阳春县城交通站负责人，对阳春县城“三害”情况熟悉。他又是阳春县公安局治安股负责人。陈学枢是县公安局侦缉股负责人。

除“三害”工作初始阶段，利用各种大小集会宣传法规，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吹赌嫖有损风俗，害国害民。又贴出禁吹、禁赌、禁嫖布告，规定“烟鬼”、赌徒在限定时间内交出所有的烟具、烟土、烟膏、赌具，妓女要从良，另谋出路。为了彻底清除“三害”，刘传发、陈学枢同志亲自出马，与公安人员明查暗访，侦缉查处。1949年12月，在春城

查获春湾人莫尤辉、合水潭寮人黎炳春的烟土共两市斤。1950年2月，获悉住在 蒟 埠街的一个新兴人暗中卖烟土。公安人员装成买烟人与其交易，收缴其烟土半市斤。1950年7月，根据朝阳街刘木提供的线索和所画的地图，一举破获梁才荣大毒窝，搜出4瓶烟膏约半斤，40多包用荔枝叶包的烟膏、8两烟土、两个制熬烟膏用的大铜勺和一批烟灯、烟枪等烟具。价值人民币五、六千元。1950年7、8月间，抓获了吹烟兼贩烟的“蛇仔精”，缴获其少许熟烟膏和二市两烟土。1950年10月，两次到烟鬼陈威家，每次都搜出大约价值人民币200元的烟土。

除收缴“烟鬼的”烟土、烟膏和烟具外，还将自觉投案和抓获的全部“烟鬼”集中公安局强行戒烟。在戒烟期间，不准他们单独行动，不准回家吃饭、睡觉。每天还要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凡是其家人送来的菜、酒水，一律要经过公安员检查后方准进食。戒烟头三、五天，这些人烟瘾发作，涕泪俱流，十分难受。这时，就给他们每人一小杯鸦片烟酒，缓解烟瘾，以后就逐日减少，十五天后，就完全不给烟酒喝，这样达到了戒烟目的。经过一个多月的强制戒烟，这些烟鬼都戒了烟。叫他们写今后不吸鸦片烟的保证书，才放回家。同时并规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每个月要到公安局汇报一次。到1950年底，春城镇再也无人吸

鸦片烟了。

1949年12月开始查处卖淫嫖娼。把30多名妓女集中训话，又召集鸨婆、鸨公学习。向她们宣传党的政策法规。通过思想教育，妓女都表示改行从良。晚上，公安人员化装进行监视妓女、嫖客出没的花艇。一发现嫖娼卖淫者，就抓起来从严处理。有时，还利用一些老嫖客去试探，公安便衣跟踪，一有发现即时“人赃”俱获。经过反复的明查暗访，打击查处，妓女卖淫少了，嫖客也少了。到1951年30多名妓女大部分都结婚了，有的也安排工作。原来的妓窝花艇也改造成成为旅店。1951年以后，卖淫嫖娼恶习被彻底清除了。查处赌博也做了大量工作，收缴麻将牌200副、天九牌、扑克牌一大批。凡参赌者一经查出，依法拘留，并给教育。到1951年，赌博现象也被根绝了。

除“三害”负责人刘传发同志说：“五十年代初除‘三害’之所以能够彻底消灭，就是有党的正确政策，并做到：一是取信于民，说话算数；不徇私情，不贪赃枉法；行动迅速，有禁则止。二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在查处卖淫嫖娼时，有个鸨公办了有金猪仔等丰盛的筵席请公安员吃，公安员毫不动摇依法办事。公安局的刑警陈×等几人，勒索、贩鸦片造成极坏影响。他们同样受到法律的严惩，有的坐牢，有的被枪决。陈学枢同志在洗马街查获一个地下赌窝，收缴4副麻将；两副扑克，并法办了赌徒。